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Karatani Kōjin

日本
现代文学
的起源

柄谷行人 著

赵京华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983

1313.065
B83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 著

赵京华 译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本书中译本业经作者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752-0

I. 日… II. ①柄… ②赵… III. 现代文学-文学
研究-日本 IV. I31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257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扉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中文版作者序

我写作此书是在 1970 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在目前的日本社会状况之下,我大概不会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刻意批判这个“现代文学”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

我试图从风景的视角来观察“现代文学”。这里所谓的风景与以往被视为名胜古迹的风景不同,毋宁说这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光。当然,在写作的当时,我还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正是康德所论及的美与崇高的区别问题。根据康德的区分,被视为名胜的风景是一种美,而如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样的风景则为崇高。美是通过想像力在对象中发现合目的性而获得的一种快感,崇高则相反,是在怎么看都不愉快且超出了想像力之界限的对象中,通过主观能动性来发现其合目的性所获得的一种快感。康德认为,崇高不在对象之中而存在于超越感性有限性的理智之无限性中。“对

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判断力批判》)。这里康德阐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崇高来自不能引起快感的对象之中,而将此转化为一种快感的是主观能动性,然而,人们却认为无限性仿佛存在于对象而非主观性之中。

我在本书中写到:风景是通过某种“颠倒”即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而发现的。那时,我好像是在阐明这种内在性即是“颠倒”似的。实际上所谓“颠倒”并非意味着由内在性而产生风景之崇高,恰恰相反,是这个“颠倒”使人们感到风景之崇高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由此代替旧有的传统名胜,新的现代名胜得以形成。而这个现代的风景不是美而是不愉快的对象这一点则被忘却了。康德说当把关怀打上引号来观察事物时,美之判断才得以成立。人们习惯把他的这个观念称为主观性美学而置之不理,其实这绝非古老陈腐的观念。比如,杜尚(Marcel Duchamp)将普通的马桶题为“泉”来参加美术展时,实际上是再一次提出了康德的那个问题。我们只关心马桶的日常用途,如果把这个“关心”打上引号来观赏马桶的话,看上去就会很像“泉”。所谓艺术不仅存在于对象物之中,还存在于打破成见开启新思想即除旧布新之中。

据说杜尚的马桶失踪了。假使没有失踪得以保存下来,那一定会华丽地装饰在大美术馆里的吧。这将是一种滑稽。然而,与此相似的滑稽却发生在另外的领域。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有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而对习惯了固有文学的人来说这无疑与杜尚的拿马桶来参加美术展相仿佛。可是,所谓马桶那样的东西不久则成了尊贵之物。往昔立志弄文

学的人为数极少且命途多舛,不用说夏目漱石就曾是这样的作家。但是,到了1970年代他则成了“国民文学”作家受到景仰。我在那时试图要否定的“现代文学”正是这样的文学。这个现代文学已经丧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坏力量,成了国家钦定教科书中选定的教材,这无疑已是文学的僵尸了。因此,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里“现代文学”走到了末路,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因为这绝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如前所述,今后,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真正的质疑,其固有的力量也将发挥出来。

以上对文学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说明国民(nation)。90年代初,《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出版英文本之际,我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刺激,决计从国民的形成这个视角来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安德森指出以小说为中心的资本化出版业对国民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我在本书中所考察的文言一致也好,风景的发现也好,其实正是国民的确立过程。不过,现在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简言之,我不满足于把国民的问题单纯作为表象的问题来思考。

Nation在日语中译为国家或民族,但近年来又译为国民,因此所谓nation state则译成了国民国家。我觉得“国民”这个译语不好,听起来有“国家之民”的感觉。实际上,人们处在国王或领主之臣下的国家里,是不存在所谓nation的。Nation乃是通过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民而形成的,而且nation也无法还原为民族。例如,日本这个国民国家里,既包含了阿伊努族(少数民族)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归化人。当然,nation易生误解并非完全来自翻译的不充分,其实本来的英语nation也是很暧昧的。看上去nation既有民族也有国家的意思,其实它并不单纯指任何一方面的意义。民族(ethnic)是亲族和族群的延长,乃

建立在血缘和地缘上之共同体,而非 nation。所谓 nation 应该理解为由脱离了此种血缘地缘性共同体的诸个人(市民)而构成的。另一方面,在封建或极权主义国家也不会有 nation 的存在,因为 nation 的成立是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等级制度得到民主化之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成立后,人们将以往的历史也视为国民的历史来叙述,这正是对 nation 起源的叙事。其实,nation 的起源并非那么古老遥远,毋宁说就存在于对旧体制的否定中。然而,在民族主义思想那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忘却,古老王朝的历史与国民的历史同化在一起了。

就这样,nation 常常与民族或国家等同视之。我们只要注意到世界上存在大量由复数的民族而构成的民族国家,及有很多同一民族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这样的事实,就会清楚将 nation 与民族国家等同视之是错误的。因此,要理解 nation,我们不要取民族同一性色彩强烈的国家为例,而应该观察如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民族同一性色彩比较薄弱的国家。在美国 nationalism(民族主义)也十分强烈,但那不可能是“民族主义”。美国的 nationalism 强调合众国是由每个个人构成的 nation,即以自由为存在的根据。实际上也是如此:nation 不是通过血缘和地缘之共同体(血与土地)而构成,如果没有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普遍性契机 nation 是无以确立的。

同时,nation 也非仅以市民之社会契约这一理性的侧面为唯一的构成根据,它还必须根植于如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我们甚至可以说,nation 是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族群共同体遭了解体后,人们通过想像来恢复这种失掉的相互扶助之相互性(reciprocity)而产生的。这是否可以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结在一起还没有定

说。再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nation 的社会契约侧面是以国歌“星条旗永远不落”(Stars and Stripes)来表征的。可是,只有这一点是无法建立起共通的感情之基础的,而作为多民族国家又不可能诉诸于“血缘”,故只好诉诸于“大地”。就是说,这是通过赞美“崇高”风景之准国歌“美丽的亚美利加”(America the beautiful)来表征的。

康德认为感性的东西和悟性的东西是以想像力为媒介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共同体性的和社会契约性的理想状态乃是以想像为媒介的。也因此,称 nation 为“想像共同体”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nation 只是单纯的想像之物,而应该说想像自有其必然性存在的。

由于货币经济的渗透,封建的或者极权主义的国家经济遭了解体,在此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确立。但这是不充分的,在这个过程中被解体的乡村农业共同体的理想状态,即互酬的相互扶助性的理想状态还必须通过想像重新恢复起来。这就是 nation。所谓民族国家正是 nation 和 state 这两种异质物的结合。不过,严密地讲,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国家乃是由资本制市场经济,国家和民族以三位一体的形式综合而成的。三者构成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关系。比如,在经济上大刀阔斧地行动,如果走向了阶级之对立,则可以通过国民的相互扶助之感情加以超越,通过国家制定规则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如此等等。这三位一体之圆环力量极其强大。例如,在这里要打倒资本主义则国家的权力会得到强化,或者在民族的感情基础上资本主义会得到拯救。因此,不应该以三位一体的一个方面为打倒的目标,我们必须寻求一种走出资本制=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之圆环的办法来。

其中,nation一般受到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否定,但是,通过启蒙是无法消解掉 nation 的。针对以启蒙来批判宗教的哲学家,马克思说:如果不解决产生宗教的现实之不幸则无法消解其宗教。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民族主义,不管怎样强调 nation 只是表象而已,都不可能将此消解掉。Nation 并非根植于血缘和土地,而是根植于相互扶助的感情,进而根植于需要这种相互扶助之社会现实。如果不顾及资本制市场经济和国家,单纯去消解 nation 是做不到的。为了真正“扬弃”nation,必须走出那个资本制 = 民族 = 国家三位一体的圆环。从写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走出圆环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在这里详加论述,唯希望诸位能参阅我最近的著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MIT Press, 2002)一书。

柄谷行人

英文版作者序

(1991 年)

我对本书抱有各种各样的不满,然而在出英文版时我并没有加以修改,其理由已在日文的“文库版后记”里有了说明。不过,文库版的说明和英文版之不做改动,其理由还不完全一样。这本书不是面向外国读者写的,也不是学术性的东西。这是 70 年代后期,我在新闻媒体领域里做的一项工作,不用说这自有其历史意义。如果是面向外国读者来写的话,我可能会换另一种写法的,如不了解日本文学的读者也能读懂的方式。可是那样一来,便要迎合外国人而做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调整与省略,结果恐怕要变成一本常见的关于日本文学的概要书了。这样的书将不能展示日本人实际上在自己的内部是如何思考的这一问題。但是,我相信本书有的部分,虽然只有对日本某一时期的文化语境有所了解的人才会懂,然基本上还是一本对外国人“敞开”的书。因此,我最终决意对英文版不加修改,只是在书的最后附上了另外写的《夏目漱石与文学类型》(即本书第七章“类型之死灭”——译注)一篇。这样,本书就成了一本以理论家漱石开篇,又以小说家漱石结尾的书。另外,又在各章后面附加了简单的补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我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对于现代文学的“批判”,在日本的语

境里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比如,70年代前期这种现代批判已多见于世,它与60年代的经济成长及新左翼运动相关联。进而言之,就连这个70年代的“现代批判”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30年代后期“近代的超克”论之变奏。大体说来,战前的“近代的超克”论是由西田几多郎、小林秀雄、保田与重郎为代表的三个群体的批评家和哲学家们所提起的。在他们那里,认为笛卡尔的二元论、历史主义、产业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都必须被超越。不用说,这不过是一种与志在和西洋列强发起战争,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日本帝国主义相呼应的意识形态而已,但又无法这样简单地弃之了事。他们之中除了众多二三流的空想理论家外,还有一些杰出的批评家、哲学家,而非清一色的战争意识形态理论家。在他们的议论中,凝缩着缠绕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话语中的诸种矛盾。可以说,在形式上,这是70年代前后的“现代批判”乃至80年代兴盛起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例如,1970年为向自卫队吁请政变而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就曾是战前日本浪漫派的成员之一,如果不考虑到历史上浪漫派式的反讽就无法理解他的行动和作品。同时代的激进主义也是如此,正像毛主义那样,其泛亚洲主义与现代文明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现代批判”与30年代的有着微妙的联系一事并非日本的特殊情况,欧洲也是一样。存在于60年代末激进主义思想根底里的“现代批判”,其知性核心——特别是后来被称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核心里,沉潜着某位思辨型哲学家所给予的“现代批判”的强烈影响。那就是积极参与过法西斯的海德格尔。众所周知,这一事情伴随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扩大又成了问题。在美国这则是以

保罗·德曼问题而浮出表面的。煽动起保罗·德曼问题的是提倡现代主义和新启蒙主义者们的—种反动的复活。而我们不能因为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就否定其“现代批判”，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对包括了这个问题在内的现代提出质疑。

“现代”这个概念十分暧昧。不仅日本包括非西洋国家的人们，在他们之间“现代”总是和“西洋”相混同。当然，这种混同是有理由的。既然在西洋也有现代与前现代之别，现代与西洋当然应该是不一样的概念，可是现代的“起源”在西洋，所以两者不容易简单地分开。在非西洋国家因而有着把现代批判与西洋批判混同起来的倾向，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错觉。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日本不是西洋的，故其现代文学并非充分现代化的。另一个观点正好相反：认为其题材和观念如果是非西洋的则作品一定是反近代的。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于日本的批评家和西洋的日本学学者之间。

但是，假如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那么，这不管是怎样反现代的或怎样反西洋的，都已经是在现代文学这一装置里了。例如，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根本就不“传统”，而是明明白白的“现代”作家。真正对“现代”抱有怀疑，就不能不质疑“作家”“自我”“表现”等装置及其不证自明性。日本的“近代的超克”是缺乏这种怀疑的。然而，当我们追问其起源时，可能会落入另一个陷阱，因为这些都产生于现代西洋。这样，我们会再次回到如“影响”这一词语所集中反映出来的那种懒惰浅薄的议论上去。所谓“影响”乃是表示“特有”和“复制”关系的一个观念。实际上，日本人写的也好，西洋人写的也好，以日本人如何吸收了西洋—现代的特有之点，又如何抵抗了西

洋—现代这样的视角写作的书籍,已是数不胜数了。

但是,如果要探讨这个特有里所隐含着的“颠倒”之特征的话,会怎样呢?我们得像尼采那样必须追溯到古代西洋吗?我是从另外的角度这样认为的:如果现代文学是西洋所固有的“颠倒”的产物的话,我觉得其性质与其说在本来的西洋(在这里其起源被掩盖了),毋宁说在非西洋国家里更能得到戏剧性的清晰展示。我将焦点集中于明治20年代的10年间文学上,其理由正在于此。

首先,我在“文言一致”的形成过程中寻找促使现代文学成为不证自明的那种基础条件。文言一致运动与其命名的意义相反,乃是某种“文”的创立。同时,这个“文”对内在的观念来说不过是一种透明的手段,在此意义上,这也是文字、书面语的消失。这个“文”的创立是内在主体的创生,同时也是客观对象的创出,由此产生了自我表现及写实等等。这种情况只要看一看文言一致确立前夜的明治20年代作家的文章,就会清晰可见。比如,在日本前现代的文学中,风景如此被主题化,然而人们却没有像我们那样去观看那些风景。他们所看到的风景是前代的文本(文学)中的风景。我们所说的“风景”是在收敛到文言一致里的认识论式的颠倒中被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发明的。我在本书中,把曾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了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当然,这是对现代的物质性装置的一个讽喻。

另外,文言一致不是由国家或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家,而主要是由小说家来实现的,这一点很重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指出,一般说来,国家的形成需要语言的本国化(本土化),新闻和小说则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也可以用来

明日本的情况。明治维新二十年后,虽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颁布了宪法开设了议会其现代化有了进展,但这里在国家形成上似乎还有些不足。而说小说家完成了添补这一不足的任务也不为过。因此,现代批判必须从现代文学批判开始,其理由也正在于此。再者,这一时期开始形成了作为学问的“国文学”,即对《万叶集》以来的民族文学历史进行再组合,也就是用现代性的透视法对过去的文学实行重构。这是与江户时代的“国学”性质不同的。

因此,本书并非文学史,而是对包括古典在内的文学史之批判。作为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进行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起源”进行批判。比如,民族主义者跑到现代以前的时代里追寻日本文学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对起源的忘却。上述的“文言一致”基本上说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的,至少在中国和朝鲜确实发生过。这与其说是在西洋的压力下,不如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发生的。不过,无论在哪个国家,对“起源”的追寻都暗藏着陷阱。如在西洋,“文言一致”运动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对此进行严密的溯源就会像德里达那样,不得不追溯到古希腊以来的“声音中心主义”。

不过,我觉得做谱系学的溯源即对起源的追溯不能走得太远。比如,许多学者上溯到中世纪以至古代以追溯反犹太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则只在19世纪后期国家经济得以确立的时期对此做了考察。她由此看到,那时不是因为犹太人的经济强大,而是相反因为变得无力化了,故反犹太主义得到了扩大(《极权主义时代》)。象征着这种国家性优势的是1871年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对此,尼采写了《反时代的思考》,说这里的胜

利不是对文化的胜利而仅仅是对国家的胜利。尼采本身,不管在哪里或者在所有层面上都要对被掩盖起来的起源加以追溯。然而,在他所生存并且对立着的时代里,正在发生的“颠倒”难道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吗?作为“欧洲人”,他带着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与之斗争的,不正是那个民族国家及其相呼应的文学吗?不管他怎样在柏拉图和基督教中寻求其颠倒的起源。

对起源的追溯不能走得太远,这最好看看批评尼采仍停留在西洋形而上学圈子内的海德格尔对起源的追溯归结为何,就可以了。这就是对发生于尼采与之对立的“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彻底肯定!而对于我在本书中所做的考察,追溯起源不能走得太远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1870年前后是世界史的转折时期,即在各地民族国家崭露头角的时期。不仅德国,还有美利坚合众国、意大利,以及战败后的法国。其十年之后,这些国家转化成了帝国主义,接下来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诞生了。

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也应该放在这个世界史的语境中来观察。观其普法战争的结果,日本的革命政府终于做出了以普鲁士为模式的选择。于是,避免了殖民地化的日本反过来经过日清战争(1894年)和日俄战争(1904年),开始挤进西洋列强的行列。日本的明治时代(1868—1911)便在如此短的时期里展示了这一变貌的过程。我所集中观察的1890年前后10年间,在西洋长期以来发生的事情(如文言一致和风景的发现),在这一时期集中地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亦反映了与西洋的同时代性。福柯说“文学”的成立在西洋不过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文学”的规范化则大概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关联,这种规范化是对18世纪英国小说所显示的那种多样性的一种压抑。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现代文学的“起源”只有在这个 19 世纪后期中才能寻找到了。若再往 19 世纪以前的时代追溯过去,仿佛可以发现根源性的东西似的,但却会忽视 19 世纪里所产生的颠倒,结果成了对此颠倒的强化和补充。因此,我想自己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追寻不会单单是日本的问题。

1991 年 9 月

学 术 前 沿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 70 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11 月